

○ 汤静涛

抗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经过近半年艰苦谈判,中国社会水火不容、厮杀十年的两大对立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终于开始了第二次合作。毛泽东在延安庄严宣告:“现在两党重新结成的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然而,这一“崭新阶段”的开端却是相当艰难、相当曲折的,其程度有时真令人难以置信。当我们追寻审视这段历史时,不难发现,周恩来1937年6、7月间到庐山直接与蒋介石谈判磋商,是其中最为关键、最耐人寻味的一段篇章。

第一次牯岭之行

1937年6月4日,周恩来抵达庐山,同蒋介石进行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谈判。这是周恩来第二次直接与蒋介石谈判,第一次则是在两个多月之前的杭州谈判。

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在潘汉年的陪同下来到杭州。此前,周恩来已同蒋夫人宋美龄等在上海接洽。周恩来向宋美龄提交了根据中共中央十五项谈判条件拟定的书面意见,请她从速转交蒋介石。当时,宋美龄表示:中共可以合法存在。宋美龄与周恩来相识甚久,尤其对周恩来代表中共直接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颇有感激之情。再加上宋美龄生于美国,受美国文化熏陶,思想观念较为开通,属国民党上层开明人士。

会谈中,周恩来重申中共中央提出的十五项谈判条件,然后提出六项具体

要求:

- (一)陕甘宁边区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
- (二)红军改编后须达4万余人;
- (三)3个师之上必须设总部;
- (四)国民党不能派副佐及政训人员;
- (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
- (六)红军防地须增加。

最后,周恩来严正声明,中共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计,与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合作,但绝不能忍受投降、收编之诬蔑。

听完周恩来的话,蒋介石首先表示: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为中国各阶层和民众瞩目。国共分家十年,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入侵局面。但蒋介石并不引咎自责。他说:过去合作的失败,双方都要加以检讨。尤其你们中共,要检讨过去的决定,你们不必提和国民党合作,只是与我合作。只要拥我为领袖,具体问题好解决。边区、红军改

樽俎之间 折冲千里

——周恩来与蒋介石的庐山谈判

李立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深切悼念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同志。

邓小平、胡耀邦、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彭真主持、王震致悼词:

“……李立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

事业和伟大的共产党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毕业精力。

“……现在,党中央决定为李立三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给李立三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应统统推倒!”

这是为李立三举行的第三次追悼会,是最后一次追悼会,也是最令人惋惜的追悼会——受迫害含冤而逝的李立三

的骨灰已经无法找到了,骨灰盒里,安放的是他告别人世时留下的一副眼镜。

物是人非,斯人不在!



编都是小事，一切都好办。

对合作方式，蒋介石提不出具体方案，而要中共提出一个永久性合作办法。

周恩来马上提出：可以采用共同纲领的办法。

蒋介石说：那你回去商量出具体办法再来见我。

4月初，周恩来回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军委洛甫、毛泽东、朱德诸同志汇报。政治局会议决定：在抗日十大纲领和国民党一大宣言基础上起草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并研究国共两党合作形式。

4月26日，周恩来飞赴西安，与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和南京政府谈判代表、国民党中央执委、组织部部长张冲谈判。5月下旬末，再飞上海，转南京，抵庐山会晤蒋介石。

牯岭，海拔1100米，在庐山群峰簇拥之上，像一头大牯牛俯瞰长江，乃取名牯岭。至1931年，中国人在此建有别墅200余幢，外国人所建多达500余幢，牯岭遂成为避暑消闲的中心。

周恩来6月4日到庐山牯岭，4天后才见到蒋介石。8日至15日，周恩来与蒋介石多次会谈，参加会谈的还有宋美龄、宋子文和张冲。

会谈前，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纲领草案》。此草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吴亮平起草，后经周恩来作了重大修改，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草案》内容主要包括3部分：

(一)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二)实现民权，保障人民自由；

(三)实现民生幸福，建立“国防经济”。

会谈开始，蒋介石一改前次杭州谈判的态度，完全抛开周恩来所带的《草案》，另外提出一个《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

这个《主张》的先决条件是：“成立国

民革命同盟会，由蒋决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的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之决定权。”其实质是在“同盟会”名义下，消灭共产党组织，而将其溶化在国民党内。

其实，早在杭州谈判期间，蒋介石曾就谈判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

(1)先由中共发表宣言，国民政府即公布红军编为3个师，45000人，3个师以上不设指挥部，设政训处；

(2)朱德、毛泽东须离开红军；

(3)边区政府可由中共推荐国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中共推荐副职；

(4)分批释放在狱中共党员；

(5)由中共方面派人联络南方游击队，经调查后实行编遣，但其领袖需离开部队；

(6)国民大会指定中共出席代表，但不能以中共名义；

(7)国防会议可容中共干部参加等。

对蒋介石这种出尔反尔、朝令夕改的作风，周恩来已不是第一次领教，但这次变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大，周恩来始料不及。尽管如此，他还是沉着而坚决地表示：对国民革命同盟会提案个人不能同意，因事关重大，必须回陕北请示中共中央后定。

周恩来明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蒋介石南京政府与中共的看法还存在相当差距。诸如：我党主张在我们的地区成立特区，由我们选出来的政府来领导，把它定名为“陕甘宁边区”。南京反对这些建议。对我党在南方一些游击区活动的部队的问题，也是一个相持不下的问题，南京企图把他们缴械、瓦解掉，我们绝不

意。关于释放被俘人员存在问题，国民党说是3000人，我们认为更多些，总计至少达10000人。关于国民大会，南京作了一些让步，但很不够。召开国防会议，时机还不成熟等等。

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事权等问题上，周恩来与蒋介石发生激烈争执。

周恩来问：红军改编后，3个师以上不设指挥部，既无统帅机关，何人管理人事、经理教育、指挥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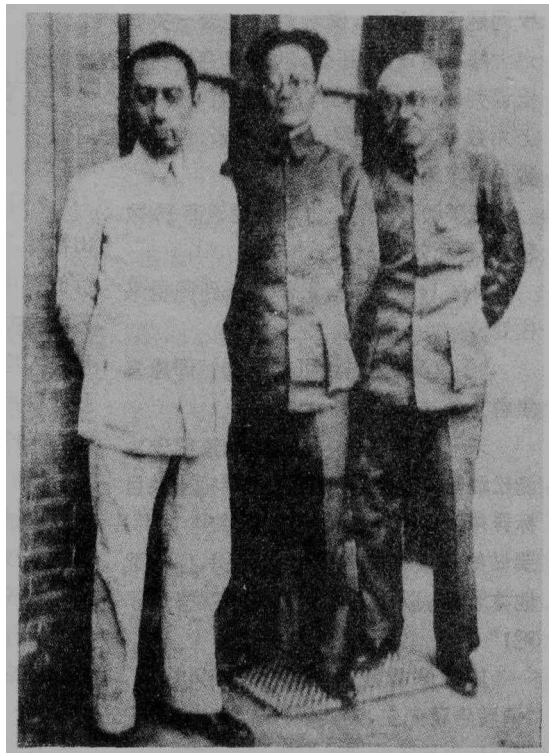
蒋介石答：可由政治机关，如政治主任来管理联络。

周恩来反问：政治机关如何能指挥军事？

蒋介石强词夺理：我要你们指挥，你们实能指挥，这是没有问题的。

周恩来强压愤懑，坚持道：政治名义管理军队终究不妥，望先生重新考虑！

蒋介石不耐烦了：好了，好了，3个师以上设一政训处，代行指挥权，这是最后之限度。恩来，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你要体谅我的苦衷！



周恩来和秦邦宪(中)、林伯渠在庐山同蒋介石谈判后回到西安时的合影。

说完,蒋便要侍卫长钱大钧送客。

蒋介石曾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周恩来则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因此,蒋总喜欢用居高临下的态度、教训部属的口吻对待周恩来。然而,物换星移,今非昔比,周恩来早已不是从前的周恩来,周恩来所代表的中共也绝非10年前那样年幼、软弱。这样谈判,能有好结果吗?

初夏的庐山凉爽宜人,云蒸霞蔚,美丽的牯岭掩藏在翠峰碧岭之间。风格独特、造型迥异的英式、法式、德式、意大利式别墅,群星般烘托点缀着牯岭街,红墙碧瓦,错落有致,楚楚动人。

周恩来无心欣赏庐山的良辰美景,心急火燎地分别找张冲、宋子文、宋美龄,反复说明以政治名义管理军队之众多不妥和困难。红军改编后,3个师以上统帅机关无论如何也应给以军事名义,请他们去做蒋介石的工作。

在周恩来看来,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权问题至关重要,倘若对方在这一关键点上都不肯让步,那么,自1937年2月西安谈判以来4个月的心血、努力,国共双方无数个方案、提案、决议、主张,岂不尽数付诸东流?

宋美龄、宋子文、张冲往返磋商10数趟,均告无效。

6月14日左右,宋子文来到周恩来住处。

“子文兄,蒋先生可有松动?”周恩来焦急万分。

宋子文摇摇头:“恩来,你想蒋先生能松动吗?他要我转告你,不要把中共目标弄得太大了,以免引起外界恐惧。你们要做的应该是先取得全国信用,你们让他太作难,以后还怎么办?你就答应了吧!”

周恩来看没有挽回余地,只好说:“请转告蒋先生,这几项只能等我回延安研究后再作答复。”

这次庐山谈判,周恩来兴冲冲而来,但却悻悻然无功而返。

8天以后,在陕北昏暗简陋的窑洞里,周恩来接受了美国记者T. A. 彼森的采访。

周恩来着重谈了与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谈判的情况,介绍了西安谈判、杭州谈判以及刚刚结束的庐山谈判的经过。周恩来向T. A. 彼森坦率承认:“在10年斗争后,要学习合作是很困难的。”

在展望统一战线前景时,周恩来充满信心。周恩来告诉这位远方客人:“中国的两个党,彼此之间已进行了10年的军事斗争。在这里,有一个革命的政党,并有着自己的地区、军队和政治组织,还有一个反动的政党,除此之外并不真正存在其他政党。国民党的统治是建立在特权集团基础上的,而共产党的统治是以无产阶级和农民作基础。以前,我们双方各有自己的政治制度:国民党的是军事独裁制,共产党是工农民主制。今天,我们必须学会合作建立统一的统一民主共和国。这种合作,只能一点一点地实现。”

第二次牯岭之行

7月13日左右,周恩来再次抵达庐山牯岭,和蒋介石进行谈判。与周恩来同行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林伯渠。博、林二人均为中共方面拟定的陕甘宁特区政府委员。6月26日,南京政府来电,催周恩来抵庐山,继续谈判。中共中央遂决定,周恩来再次见蒋时,增加博古、林伯渠,以便讨论纲领,与蒋切实商谈国防计划及修改和召开国防会议问题。

当天,周恩来即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交蒋介石。这份《宣言》是周恩来在延安时亲自起草的。

《宣言》重申了中共的四项保证:

(一)本党愿为三民主义彻底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运

动;

(三)取消现苏维埃政府;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宣言》提出中共奋斗的总目标:

(一)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解放;

(二)实现民政政治;

(三)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和愉快生活。

途经上海时,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曾专程到香山路中山故居拜会宋庆龄。周恩来向宋庆龄介绍了西安事变以来我党的方针政策,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以及西安、杭州、庐山等多次谈判的简要情况,征求宋庆龄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意见。宋庆龄表示:完全拥护和支持这个《宣言》。

7月14日,张冲会见周恩来。张冲,字淮南,浙江温州人。1932年,曾与陈立夫、徐恩曾等策划“伍豪启事”,给周恩来制造了很大麻烦。但自西安事变以来,张冲充当国民党谈判代表,与周恩来合作较为融洽和谐。

张冲代蒋介石转达了关于同盟会纲领等问题,其中红军改编后指挥权问题,蒋介石又一次自食其言。蒋介石提出,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

宋朝太诗人苏东坡咏庐山诗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写尽了庐山的虚无飘渺、变幻莫测,但蒋介石比庐山的云雾还要变幻无常。周恩来又一次被愚弄了!中国共产党又一次被愚弄了!

早在来庐之前,周恩来还曾从延安专电问讯红军改编指挥机关之事,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钱大钧代蒋复电:仍以庐山所谈办法解决。于是,周恩来便向中共诸位领导和红军诸将领反复解释,苦口婆心劝说大家:只要政治机关能统辖指挥、人事各事,名义如何定不必计较,各位同志始以大局为重,不再争议。

如此重大让步,如此顾全大局,如此委屈退让,其心之诚,其意之挚,苍天可鉴!

周恩来气愤至极。7月15日,奋笔疾书,致函蒋介石,郑重指出:“现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继而指出,蒋介石此次要求与六月谈判“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请求从速与“林、秦两同志同时晋谒”。

3天过去了,至17日,蒋介石又摆起一国之尊架势,在邵力子、张冲等陪同下,会见周恩来、博古、林伯渠。

周恩来向蒋介石建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尽速发动全国抗战。

蒋介石反应十分冷淡,闭口不提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之事。唱主角的是邵力子、张冲。蒋介石心不在焉、金口难开,全然一副至高无上、傲视群臣的派头。

可在这天国民党召开的第一期庐山谈话会上,蒋介石却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激情澎湃。

蒋介石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尔后,话锋一转,又说:“在和平根本绝望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和平的。”并称,芦沟桥事件的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希望由和平外交方法,取得芦事解决”。

在这次谈话会上,何应钦等亲日派首领也粉墨登场,耸人听闻、大放厥词。

何应钦说:中国武器不如日本,若开战,7日之内中国必亡!

孔祥熙乃堂堂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蒋介石的连襟,但这位皇亲连襟大人竟也说: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

张群还当着全体与会者面,恬不知耻地向蒋介石进14字箴言:“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安。”

这次谈话会,国民党地方政府县长



1937年8月,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在延安合影。

以上官员和一些知名学者、教授都参加了,但主持人蒋介石为限制中共公开活动,却不准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出席。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庐山谈话会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份。我同林伯渠、博古同志三个人不露面,是秘密的。”

当晚,周恩来与博古、林伯渠紧急磋商,将预备谈判内容,拟成十二条书面意见。

书面意见主要内容包括:

(一)准许全国各报刊载《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中央发出书面谈话赞同;

(二)迅速发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3人中择一人担任正职,其范围包括现所辖延安等陕、甘、宁交界18个县,其疆界请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边区划定;

(三)国共双方派人分赴鄂豫皖、闽浙赣、闽粤赣、湘鄂赣等地联络与传达国共合作方针,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实行改编;

(四)允许中共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在全国发行;

(五)对红军改编的具体意见。

第二天,周恩来再走“夫人路线”,又一次找到宋美龄,通过宋美龄将书面意

见转交蒋介石。就在这天下午,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和蒋介石、邵力子等举行了新一轮会谈。

周恩来向蒋介石传递了陕北的两个最新信息:一是“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日,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另一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政治处制度,请求设正副主任,以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率”。

当谈到日落西山,晚霞满天,松涛阵阵之时,蒋介石仍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能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3个师的管理权直属行营,政治机关只负联络、传达之职,可由周恩来、毛泽东为正副主任,3个师的参谋长仍由南京派员担任。

对此,周恩来强硬地表示:这个意见,我党绝不能接受。

谈判已陷僵局,妥协再无余地,周恩来等匆匆离开庐山,转赴上海。

面对蒋介石的反共限共政策,中国共产党既不能屈从,也不能分裂。屈从,只能使党丧失独立性,重蹈大革命失败覆辙;分裂,必然导致团结局面破裂,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这一切,都给担负谈判任务的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带来莫大困难。这就要求周恩来必须用超人的斗争艺术和灵活

荣事达



○ 李呈三 邢淑敏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翻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一页。就在同一年同月内,“荣事达电气有限公司”从原合肥洗衣机总厂的怀抱中蹦跃而出。“荣事达”,这个响亮的品牌,由此伴着时代潮声,迅速响遍神州大地,它由原来的单体制工厂发展为拥有8个子公司、若干参股企业、层次分明的大型现代企业集团,洗衣机年产销量增长4倍,资产增长17倍,在同行业中由名不见经传跃居全国第一、世界最大。弹指5年,“荣事达”历经了沧桑巨变。

探寻“荣事达”5年来的足迹,透过与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陈荣珍先生的一席谈,“荣事达”思辩式发展之路凸现在我们面前。

巧妙的斗争方式,纵横捭阖,反复周旋,打破僵局。

在两次庐山谈判中,周恩来的谈判艺术可以说又一次得到磨练,开始日趋成熟、老道。

周恩来在谈判中对原则问题从不动摇,据理力争。在具体问题争执不下时,又能在不损害中共根本利益原则下做出

“独生子”政策 ——夯实第一主导产品基础

陈荣珍总经理有句名言:“坐稳身子,再出双拳。”他解释,“身子”是指荣事达的第一主导产品洗衣机,要把洗衣机这个“独生子”养大养壮,否则,过早开发第二主导产品,就会“出拳危险”。这成为荣事达五年发展的第一要招。

1993年4月,在一次赴广东佛山的引资洽谈会上,陈荣珍谢绝了为大多数人事先看好的滚筒洗衣机项目,而是以引进资金发展大容量双桶和微电脑全自动洗衣机为目标,与香港公司达成了合资协议,充裕的资金使新产品迅速上马,形成批量,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市场机遇。

让步、灵活转圈,还非常善于通过各种渠道,如宋庆龄、宋美龄、宋子文等民主开明人士,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和影响,尽可能地影响、改变蒋介石的态度。

由于周恩来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结合,两次庐山谈判,在中共合法地位和红军改编指挥机关等问题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但使中国

同年8月,“荣事达”与日本三洋电机株式会社等共同投资兴建荣事达三洋洗衣机有限公司,专业生产模糊控制全自动洗衣机,不仅填补了荣事达系列洗衣机高档产品的空白,而且引导了中国洗衣机消费的新潮流,掀起了新一轮“模糊热”。目前,这个公司已成为全国最大模糊控制洗衣机生产基地,占有国内同类产品80%的市场。

“荣事达”的稳扎稳打,使年产销量不断上升,1992年44万台,1995年即达到127.7万台,跃居行业第一,1996年突破150万台,蝉联国内市场第一。

“荣事达”快速成长,在于它舍得进行R&D(研究和开发)投入。5年来,“荣事达”先后投资1个多亿,建成了华东地区最大、国内一流的模具生产基地,4个

共产党在政治上一直处于主动地位,政治影响一天天扩大,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一次次重新审视中共及其抗日主张,为中共彻底摆脱以往那种狭小窘迫的境地,从而走向中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的舞台开辟了光明通道。

(作者单位: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